

“研究学术，贵致用也”

——叶恭绰办学思想探析

向书芳

叶恭绰(1881—1968)是我国近现代知名学者、书画家,也是政治史上一位有影响的人物。自1906年进入清廷邮传部,因工作实绩不断得到提升,历任清政府铁路总局提调、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、总长,以及国民政府铁道部长等职,是旧中国交通史上的重要人物。在二十世纪初期,作为交通部要员及政府官员,凭着多年办交通事务的经验,以及游历日本、欧美考察政治、经济、交通和教育的经历,试图通过办教育兴交通、进而兴国家的愿望,将交通部设于上海、北京和唐山三地四所高等专门学校,合并改组并定名交通大学,使得交通大学一直与教育救国、实业救国、科学兴国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在其任交通大学校长主持校务期间,对交通大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,促进了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;尤其提出的研究学术的办学思想,对交大后来

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在今天看来仍具有现实意义。

一、“研究学术,学术独立”

叶恭绰主张大学要进行学术研究,在国外考察期间,他就敏锐地觉察到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,“方今科学昌明,无处不有学问,小如砌墙运铁,大如行车造路,莫不含有至理,蓄有精义。非如往昔,但计成功而不拘效率者”^{[1][346]},科学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中,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。“我国实业之不发达,由于处境使然者半,由于自身缺乏能力者亦半,而实业学校之不能尽学术上之贡献,为充分之援助,亦不无多少之关系。”世界知识日新月异,必须努力研求学习才可能追赶先进。“欧美各国实业之振兴,多由国立及私立之研究局、试验所及各学会之协助,故能新理

层出，利用日宏，其重视研究之精神，几引为工业学府之天职。环顾我国，瞠乎其后，则比较完善之大学，讵能放弃责任，自封故步。”^{[1]261}西方发达国家都很重视科学的研究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，尤其是高等学校。

交通大学组成之初，叶恭绰就计划要在交大创设研究院。设立研究院的目的，一方面要招收研究生，使本科毕业生中愿意继续深造者，有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的机会和场所，不至于完全依赖向国外派遣留学生这一条途径。另一方面，给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研究学术、探讨学术、发展学术的场所，介绍世界最新的科学技术，从事独立研究和发明，解决国内现实中存在的难题。“如以工业言，则关于国产材料之试验，制造方法之改良，管理学术之研究，以及其他方面之科学应用，均赖大规模之研究所为寻求真理、发展学术之地”。大学不只是教授知识、培养人才的场所，进行学术研究，是大学的重要任务之一。

叶恭绰提倡学术研究，还极力提倡学术独立。他在交通大学开学典礼中提出“诸君修学，当以三事为准衡：第一，研究学术，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，不受外力支配，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；第二，人类生存世界，贵有贡献，必能尽力致用，方不负一生岁月；第三，学术独立，斯不难应用，学术愈精，应用愈广”。学术独立必须有学术自由的环境和氛围，离开学术自由，就很难鼓励学术独立；没有学术独立就难以进行学术创新，没有创新性成果，就无法谈贡献与应用。学术独立，一方面指学术研究活动不受社会限制，如政府干预或政治的影响。表现在高等教育外部，教育要尽可能免受政治风潮的影响，学校内部有学术自由的环境和条件。这也是因当时中国社会军阀林立，政治局势动荡不安，严重影响到高等学校的稳定和发展，因此学术独立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。另一方面指作为研究学术

的主体自身，要摆脱外在因素的影响，追求个体内部、个体精神层面的自由或独立。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认为，学术研究以自己为目的，并大力主张学术独立，学术研究应该远离功利诱惑，保持其崇高的独立精神。叶恭绰着重强调的也是后者，即研究者自身精神的独立。“夫学术之事，自有其精神与范围，非以外力之逼迫而得善果者”，研究者要把学术研究和个人的精神打成一片，摆脱学术以外的各种物质利益诱惑，如金钱、名誉、权威、权利及地位等，使学术活动为一种原始的好奇心所驱使，使学术活动成为个人的兴趣。学术独立体现人的人生价值和生存意义，“学术独立，应用方宏”^{[2]202}，学术研究实现了独立，不急功近利，“终持以专一不懈之精神”^{[3]6}，研究自然能够深入，应用于实践才能有力和广泛。

交通大学组成后，学术气氛明显活跃。三校各种学术团体相继建立，各种刊物、丛书纷纷出版，学术论文增多。如交通大学上海学校成立了工程学会、工程研究会、经济学会及后来的南洋大学学术研究会成立；相继出版了《南洋学报》、《工程学报》、《经济学报》等刊物、丛书，内容包罗万象，其中有不少是科学研究论文。1922年1月，《交通大学月刊》第一期正式出版，上面载有唐校教授茅以升、陈茂康，沪校教授周铭等人的学术论文^{[4]119-120}。学术交流活动蓬勃兴起，学术研究的气氛日渐浓厚，并多次邀请专家和名人到校内演讲。所有活动（包括各种社团组织的纷纷建立）都是学生和教师自发、自主性地组织和参与，学校内部呈现出民主和自由的学术环境和氛围，交通大学处于欣欣向荣、蓬勃向上发展的一派新气象之中。加强研究学术的思想，调动了教师和学生研究工程技术、社会问题的积极性，推动了交通大学科学的研究的发展。

二、“研究学术，贵致用也”

叶恭绰提出大学要“研究学术”，但更重视实际应用，“贵致用也”，并主张高等学校的教育要为国家实业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。研究学术的终极目的是致用，工程技术尤其如此，因此，在教育过程中要注重实践教学。叶恭绰特别注重交通大学的实践教学环节，在交通大学组成之时拨付巨资修缮并增建试验室和实习工厂，添置机械、仪器、图书、教具等，以便为进行教学和科研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。在此基础上，“并经拟订计划，另筹一百万元之基金，为逐年扩充之预备”^{[1]259}。沪校新建成的机械实验室和机械工厂（机械工厂的规模在当时国内高校中是少有的），既可为学生提供实验和实习学习的场所，又可以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技术推广工作。交通大学的教学实践环节比以前更加健全和完善，把校内实习和校外的实习、参观学习结合起来，培养学生实际应用知识的能力，更好地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，学以致用。

对大学生，叶恭绰希望他们能够积极、主动地探索和研求学术，不受外在因素的影响，培养独立意识。学术独立，还要以服务为宗旨。“研究学术，在人类之虚欲言之，当独立；而在人类之幸福言之，贵致用也。”^{[1]346}即在精神上、思想上要达到独立，培养独立意识，不盲目服从，而研究学术的最终目的贵在致用；一个人把自己一生的所学贡献于社会，这样的人生才不算虚度。“鄙人深信学校之目的在于培育人才，而其机能则并足辅佐社会之发达”^{[1]346}，高等学校除了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专门人才外，还必须辅助实业，服务社会。这是高等学校又一重要任务。前文已提到，交通大学组成之初有创设研究院的计划，进行科学研究、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。1926年，值交通大学校庆之际，叶恭绰又一次提到大学的目的，“不仅在培育人才，其机能

功用，实足以辅助社会之发达”^{[1]260}。

研究学术成为交通大学的重要任务之一，并直接影响了交通大学的办学方向。也就是说，交通大学在叶恭绰执掌校长后，不只是名称上由工业专门学校升格为大学，办学宗旨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，即从原来单纯的培养专门人才转向既要为社会培养人才，又要注重高深的学术研究，顺应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潮流，走上了培养人才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办学道路^{[5][14]}，为交通大学向现代大学制度的转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。

三、“学术愈精，应用愈广”

在学习内容方面，叶恭绰比较提倡学习上的专和精，因为社会本身就有分工的。以交通为例，“顾交通中之任何事业，无论若何简单，均含有多种学术，互有关系，非一种人才能办”；“而集多数专家，分工合作，则求其协调动作，必各先有其准备及合法之训练。”^{[1]256}叶恭绰在交通部供职期间，曾主张选择派遣铁路人员去国外学习，专门学习和研究一件事情，学成归国后再经过实践锻炼，会有更好的效果。“自先生迭长部务，即累经指派部员及三校毕业生出洋留学及实习，”^{[1]172}如被誉为继詹天佑之后的铁路巨擎杜镇远，因条件优秀，叶恭绰遴选留学生时曾被选中远赴美国公司学习，后进入康乃尔大学攻读硕士学位。如果人们“能够各专一事，齐一步骤，分工合作，其在事业上所共同发挥出来的能力，当然会显得格外坚实伟大”。国民政府时期，交通部改为铁道部，铁道部有一次选调各路人员准备组织一个测量队，“各路人才不为不多，而事实上想要组织一个完善满意的测量队，竟致非常的不容易着手。”“因为专精于一件事情而有特殊心得与贡献的人才，眼前仍感缺乏”。叶恭绰因此向大家提出，每个人除了努力工作外，对自己所担

任的职务,通过学习,培养经验,要精要专,要“贡献于自身所致力的事业上。”^{[2]431}

叶恭绰提倡学习和研究上的专和精,并不是反对知识的广博,而是要“由博返约”,学有所归,即先博学后专精,因为“非博则不能通,非约则不能精”^{[3]35},“约”就是少、专。叶是一个杂家,也可以说是一个通才,用他自己的话“铁路以外,余于外交、财政、实业、教育、文化,暨其他有关管理与技术之事,亦深感趣味”,如对文学艺术、文物鉴赏、史地掌故、书画、建筑等等,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,文化事业中,尤其“对国外文化宣传及图书馆、博物馆三者,致力较深”。然而他又说“博而不专,世之通病”,由于自己平时涉猎的门类太多,结果把“有限的时间、精力,仍泛滥于无涯之境,但任何门类均乏精深的探讨”^{[3]354-355},自己也感觉到很可惜。叶恭绰对自己的这番自我批评是很诚恳、很谦虚的,基本符合他的实际。在这一点上他与蔡元培很相似,两人都是封建社会旧知识分子出身,蔡元培认为自己“受中国读书人之恶习太深”^{[4]40},博览中西,泛滥百家。中国读书人的恶习就是博览而无系统,散漫而无中心。正因为认识到自己的不足,叶恭绰晚年把时间和精力集中于文化和考古事业上。

“人事无穷”,叶恭绰主张精研学术,注重学习内容的专和精是自己人生经验的总结。同时在学习和工作经历中还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学习方法,如阅读、询问、讨论及实地考察等,这些都可以供学习者借鉴。

四、叶恭绰研究学术思想的进一步分析及对今天的启示

叶恭绰提倡科学的研究、学术独立,对学术独立有自己的见解。我们知道,蔡元培1917年开始在北大提倡和重视学术研究,并提出“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的办学指导思想,主张学术自由,将不同派别的学者

集于一校。并进一步认为,教育的终极目的应该使人达到最高的精神境界,即实体世界。叶恭绰在交通大学也提出学术研究和学术独立,比较叶恭绰与蔡元培在对待学术研究上的异同,两人都重视学术研究,这是他们之间的共同点。两人都主张学术独立,蔡元培更多地强调学术独立、学术自由的外部环境,“外在的自由”,为学术自由的真正实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,或者说是可能性。如学位独立,大学有授予学位的权利;有审定学术水平的自由;思想自由,言论自由;有调查自由等。发展学术,学术独立,学术活动不受党派、政见及其它社会关系的影响,教育独立。叶恭绰提倡学术独立,侧重于学者或学生自身,“故求学术造诣之深,必先以学术为独立之事,不受外界之利诱,而后读书真乐”。研究者要超越对各种物质的依赖和外界因素的逼迫、引诱,使学术活动成为一种兴趣,和自己精神追求结合起来,实现精神层面的自由,“内心的自由”。培养独立意识,主动、积极地进行学术研究,不急功近利,始终持有王国维所力主的“为学术而学术”的精神。实现学术自由所要突破的限制大体包括两个方面:外部的社会限制和主体自身的限制。蔡元培主要侧重突破外在的限制,叶恭绰则侧重突破内在的限制。叶强调学习和个人的精神必须打成一片,研究学术,精神和意识要独立、自由;他又进一步提出,“学术独立,非必与致用分离”^{[5]346}。

在研究学术的目的上,叶恭绰与王国维两人之间有所不同。王国维认为学术研究以学术本身为目的,而不应在学术之外去寻找目的,“欲学术之发达,必视学术为目的,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”^{[6]221},即为学术而学术。叶恭绰认为研究学术的终极目的在于致用,研究学术,对人类幸福而言,贵在致用,要学有所归,服务社会。既要达到精神上的独立,又要最终能够致用。理想

和现实结合起来,或者促进社会的精神文明,或者促进社会的物质文明,为人类社会做贡献,把研究学术提高到了一个极高的层次。应该说,叶恭绰在研究学术问题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,这与他在交通方面多年的工作历练和人生阅历有很大的关系。

研究学术为大学的天职,如今中国的大学正在向世界知名大学努力奋斗,更应以探索学问为己任,在保持优良的学术传统的基础上,重塑大学的学术自主精神。处在经济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,在市场经济利益的驱动下,过于注重市场效应,容易助长人们浮躁的心态,追求眼前利益。高等教育也不例外,浮躁的学风、腐败的学术道德在中国的高校和社会上已屡见不鲜了。有些大学的改革追求高的“学术”产出,对中国真学术的未来前途不见得是一件好事。“为学当以发明为主”,“学问之事,虽一科之微,非数十年穷老尽气,不能有以自见”^[3]。急功近利的学术成果,其高质量实在令人怀疑。客观公正的学术评价、宽松的学术氛围,制度上的一些保障确实能给学术研究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。只靠严密的规章制度和条文还不够,学术自主要有其内在的动力,将学术和教育事业提升为“天职”的精神,这种精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,但是能够感受到,一代一代的学者、学生能够切身感受到,并愿将其传承下去,这种精神就是叶恭绰所提倡的学术独立。换句话来说,在研究学术过程中要完全抛开外在的物质,潜心钻研,持之不懈,踏踏实实搞学术研究,而不是成为物质的依附者,金钱、名利、权势的奴隶,学术独立是人类对于新知的渴求热爱,对于生命价值的追求,学有所成,学有所归,服务社会,为人类社会做贡献,仍然是今天我们的教育工作所应孜孜以求的目标。具备自己的学术自主精神的大学所培养的学生才会有德有才,敢于面对现实困境的挑战,也

敢于承担责任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叶恭绰.遐庵汇稿(第一辑)[M].1930.
- [2] 叶恭绰.遐庵汇稿(第二辑)[M].1946.
- [3] 叶恭绰.遐庵小品[M].北京出版社,1998.
- [4] 霍有光,顾利民.南洋公学—交通大学年谱[M].陕西人民出版社,2002.
- [5] 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.交通大学校史(1896—1949)[M].上海教育出版社,1986.
- [6] 遐庵年谱汇稿编印会.叶遐庵先生年谱[M].1946.
- [7] 耿云志.蔡元培与胡适[C].蔡元培研究会编.论蔡元培.旅游教育出版社,1989.
- [8] 黄书光.中国教育哲学史(第四卷)[M].山东教育出版社,2000.

作者:

闫书芳 西安交大图书馆馆员